

引 子

在北中国的中部，横亘万里有一座大山名曰太行山。山西省即因位于太行山西麓而得其名。又因此地大部归属春秋时期的晋国，故山西又别称为晋，所谓三晋大地即指山西。元朝时这里设河东山西道宣慰司，至明朝初年改置山西省，其后则一直沿用至今。山西位属黄土高原，平均海拔千米左右，著名的黄河流经该省西南，是为晋陕、晋豫之分界线。山西省内山川纵横，关隘陡立。名山有太行、五台以及恒山等，其中五台山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恒山则为著名的“五岳”名山之北岳。在这些大山之间长河横贯，有黄河、汾水及桑干河、滹沱河等。其中黄河干流流经山西西南并切穿吕梁山南麓时，巨大落差造成著名的壶口瀑布，令人叹为观止。太行山间有“太行八陉”之说，为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通孔道。北面山地沿内长城又有关隘密布，著名的有雁门关、平型关和娘子关等。其雄关险要，堪当仰止。历史上，山西亦为中华民族著名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孕育了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也孕育了这一方水土上的灿烂文明。在山西境内，人们会为众多的名胜古迹而目不暇接，会为诉说不尽的历史掌故而如痴如迷；更会为淳朴的山西百姓那山一般的胸襟和水一样的情怀，而感动而倾慕甚至至于流连忘返。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那一方至纯至朴的水土，就格外显着令人向往了。

大概也正因此，人说山西好地方啊！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山西可以说出了三位世人瞩目的名人。

一位就是曾在山西主宰地方近半个世纪之久，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此君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何应钦为同窗学友。辛亥革命后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后于抗日战争中官至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解放前夕又短暂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等。阎锡山虽早年亦追随孙中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半途而废投靠蒋家王朝，终于落得个亡命孤岛、了此残生的可悲下场。山西名人中的另一位则是著名的徐向前元帅——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卓著功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向前为山西五台县人，第一次大革命中投身革命，为黄埔军校一期高材生，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事总指挥，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亲自指挥了临汾战役和太原战役。全国解放后于 1955 年徐向前被授衔为元帅，并一度官至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元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于 1990 年 9 月 21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9 岁。

在这里我们要讲的第三位山西名人，也便是本书的主人公孔祥熙了。

公元 1880 年 9 月 11 日(旧历八月初七)，在山西省太谷县西郊程家庄孔氏宅内，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号，一个白白胖胖敦实可爱的小男孩降临人间。一时，年轻的父亲孔繁慈喜得合不拢嘴，忙不迭地弯腰在案前查阅孔氏家族的族谱。按照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乾隆皇帝御赐孔府的世系排行字——“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来择选名字，孔繁慈给自己心爱的胖儿子起了一个十分文雅且又吉祥的名字：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后来孔祥熙赴美留学时，又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H. H. Kong，此即后来人们戏称的‘哈哈孔’的最初由来。此为后话了。

依据族谱，孔祥熙为至圣先师孔子第七十五代裔孙。

距此大约 9 年之后的 1889 年 7 月 15 日，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上海，华美印书馆的老板宋查理家里，又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便是后来孔祥熙的第二任妻子亦即众所周知的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当年宋查理为了纪念自己在美漂泊期间的恩人卡尔将军的夫人南希·卡尔，便给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命名为南希（英文教名），中国名字则叫爱琳，后改为蔼龄，意即和蔼可亲。

当时大概没有人能料想到，冥冥中的造物主已经为孔祥熙和宋蔼龄这两个人做了那么妥贴的命运安排，简直天作之合一般。

孔祥熙的孩提时代是在一种平淡以至黯然的气氛中度过的。他 6 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尽管父亲孔繁慈为了心疼一对小儿女以致终身未再续娶，但毕竟母爱是无法替代的。加之当时正逢家道中落，所以后来世间有孔祥熙去太谷城拾捡煤渣之说。虽然传闻种种且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这就是孔祥熙的童年饱尝了不幸和艰难。

与孔祥熙迥然不同的是，宋蔼龄的童年生活要幸福的多了。她在一个民主精神很浓的家庭里，接受的是完全正规的西方式教育，并得到宗教氛围的熏陶。当时的宋家在上海已属中等以上家庭，所以生活亦十分优裕，从而也为宋蔼龄及其弟弟妹妹的成长，提供了富足优越的物质条件。

伴随着近代中国那段苦难岁月的缓缓消蚀，孔祥熙和宋蔼龄慢慢地也都长成了大人。而在这成长的过程中十分有趣的是，或许又是命运之神的有意安排，孔祥熙和宋蔼龄两个人的共同点逐渐地多了起来——两个人都笃信基督教且都留学美国，接受完全的西方教育；尤其令人称奇并赞叹不已的是，孔祥熙和宋蔼龄早年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可以说两个人当年都曾为革命事业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然而也就是孔祥熙和宋蔼龄这两个当年的热血青年，后来竟双双在革命的道路上半途而废；甚而至于最终堕落成为万夫所指

的人民公敌，以至晚境凄惨，亡命天涯，终老而未能得返故国。此亦令人扼腕哑然哉！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孔祥熙便彻底地人生向右转，死心塌地认蒋介石为主子而卖身投靠。其后近二十载春秋岁月之中，孔祥熙可谓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极尽风光之一时。最高峰时他官至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副院长以及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跻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列，并以私家财富之巨位列“四大家族”之首。

而在孔祥熙步入深渊的整个过程中，宋蔼龄不仅为虎作伥难逃干系，甚至可以说是她在背后操纵并设计了一切。在宋氏家族最终明珠暗弃的全过程中，宋蔼龄这个宋家的大姐大恐怕难辞祸手之咎。1973年深秋宋蔼龄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院故去后，曾有一位西方记者以这样的笔触来评价她说：

“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她的财富之多仅次于她的弟弟子文，她也许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真正设计师。”

这位西方记者最后一句的评价，在笔者看来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老巴尔扎克就尖锐地指出：“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

这句著名的话不仅谏语般揭示了孔宋家族血腥的发迹史，而且也预言了他们最终必然的黑色归宿。可以说，正是孔祥熙、宋蔼龄二人不可抑止的贪欲和权势欲，致使他们暴敛财富不择手段，并最终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然而有道是物极必反，也正是孔宋二人这种急剧膨胀的欲望，驱使他们在攀上高峰的同时也

步入绝顶，以至最后由峰巅堕落，留了个千古骂名。

最近有材料披露孔祥熙、宋蔼龄两人晚年在美的乡思乡情，现录此存照，由中不难看出孔宋二人晚境之凄凉孤独：

“孔祥熙吃过早饭，就把身子蜷在沙发里，歪着头在那里叹气。宋蔼龄提醒几次，今天该是去银行上班的日子，孔祥熙照样一动不动。

‘怎么了，是不是身上不舒服？’宋蔼龄关切地问。

‘不，我梦见我在井儿院把半筐捡回的煤渣倒在灶前，奶奶瘪着的嘴露出了微笑。后来又梦见在铭贤学校给学生讲矿产开发课，学生们嚷着要我带他们去实践。唉！都是梦哇。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后半生决不到政府作官……我要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孔祥熙说着，眼角滴出了浑浊的泪水。

宋蔼龄也伤感起来：‘我最近也老是作梦，都是童年的事，都是与父母弟妹在一起的事，每次醒来半天心口堵得慌……’

两个人都不吭声了。

‘我听说人老想过去的事就是老年的征兆。我们真的老了吗？’宋蔼龄还是先开了口。

‘老了——’孔祥熙伸出干枯的手去挠花白的头发。

‘老了……’宋蔼龄喃喃地说，‘我准备在父亲逝世 30 周年时好好祭奠一下，可这么多年了，我都没能到父亲墓前去看一次。父亲在世时给了我多少慈爱啊……’

两个人无言，一会都嚤嚤啜泣起来。

孔祥熙忽然坐正了说：‘蔼龄，你想家，想祖国？’

宋蔼龄瞪圆闪着泪光的眼睛：‘是的！’

‘我们——回去？’孔祥熙试探着说。

‘回哪里？’

‘大陆——’

‘啊——’宋蔼龄浑身一哆嗦，‘自从 1927 年我们把宝押在蒋

介石身上,到 1947 年整整 20 年啊,共产党能饶了我们吗?’

‘我们把财产都送上,算是折罪……’

‘不行,不行!’

‘那么多战犯都放了出来,甚至有的还当上了文史研究员,我们回去总不至比他们还差吧!’孔祥熙认起真来。

‘人家来本来就在大陆。我们要从这儿回去,恐怕不仅美国政府不会同意,就是老蒋知道了也不会放过我们。搞不好,我们连个寿终正寝的地方也得不到。’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眼看我们都是快入土的人了。难道要落外丧,当野鬼?’

‘那怨得了谁呢?’

.....”

纵观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的整个一生浮沉遭际,恐怕只能再一次印证先哲们的微言大义和颠扑不破,这就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信哉斯言!

第一章 孔祥熙家世

1. 太谷票号的传说

太谷县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属山西腹地，位于榆次西南，距省府太原约 90 里有余。太谷县境内地势为东南至西北走向，东南地区山峦起伏，高峻险要；西北地区则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太谷县称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原气候。受这种气候的影响，这里一年四季分明，冬冷夏热，春旱秋涝。每年一到秋天，太谷县境内便呈现出一派的萧条和凋敝景象：凉风习习刮得树叶枯黄满地飘零，秋雨绵绵下得一地泥泞难以落脚。据说，当年太谷人大多不愿意在家乡待见那令人沮丧的秋季来临。虽然，惯常的秋天都是收获的季节，是令人欣喜令人满足的日子。可在太谷则就不然了。贫脊的山地加上恶劣的气候，十年倒有九年令种地的庄稼人失望，以至满面愁容无可奈何地打发着眼前那种令人寒心的秋天。

尽管如此，当年的太谷人中仍旧不乏富翁。这是因为，当时的太谷县内，人们往往是一家几代人都经营着票号。当年在山西，人称两个地方最富裕，一个便是太谷，一个便是祁县，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叫做“金太谷，银祁县”（另有一说则认为当年山西票号最发达的地方有三个，首推平遥，其次才是太谷和祁县，此处不做考证）。上面所谓的地方富裕，亦是指太谷和祁县两地的票号发达而言的。

所谓票号本是在清朝道光年间慢慢兴起的一种金融机构的名称。当时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帮商业资本便与金融资本结合，形成了这么一种相当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并称之为票

号。因为当年在山西那样一个偏僻闭塞之地，交通异常不便，出门在外的富商巨贾以及放任外省官吏出门携带大量的现银既有许多不便，又难免相当的风险。而有了票号这种专门的金融机构转寄汇兑，就方便多了也放心多了。所以当年的票号主要经办汇兑、存放款以及代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同时收存中央和各省地方官款，以及吸收官僚富豪存款并给予借垫等业务。至清朝末年，山西全省票号已发展至 30 余家，分号 400 多处并且辐射国外包括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以及俄国的莫斯科，还有东南亚地区的泰国、新加坡等地，一度基本上垄断了北中国乃至全国大部的汇兑业务。

关于太谷的票号，后来孔祥熙曾自诩其“知之甚稔”。据他讲来，票号的产生是由清朝初年北方特有的镖局演变而来的。清人自入关以来遍及中国各地，其所需银饷及食粮，都是由各地征集而来。为防粮饷运输途中有恙，当时便在许多通都大邑设起了负责沿途护送的镖局。但因这种运送往往缓不济急，故后来就有了所谓“过镖”的变通办法，即在各地联号的商家互通汇兑，每 3 个月结账一次。当时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家，俗称汇兑庄，又称“票号”、“票庄”等等。此即后来山西票号的最初滥觞。

当年的太谷县不过是个内陆小城，地处偏僻又人口寥寥，物产稀少且交通又十分不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当年居然票号林立，并且历经百年而不衰，许多信誉卓著且规模宏大的票号，最初均发迹于此，甚而至于有了“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这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孔祥熙发迹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大谈特谈太谷人精于“票号之道”并且信誉最响：“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都操在山西太谷、祁县和平遥三县人士之手，尤以我所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我们了解了当年太谷票号之盛况后，方始信孔祥熙的话果然不是吹牛。

谈到当年太谷票号的卓具信誉，这里有一传说或可从某一侧面佐证之。当年有一位外省的商人，因为出门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恐路上不方便，便托付太谷的一家票号转寄现银 500 两。不幸的是，这位商人竟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在他乡了。而太谷的这家票号等了 3 年仍不见有人前来兑银，老板便派出得力的伙计赴全国各地苦苦查找。就这样又找了 3 年，终于找到了那位客死他乡的商人后裔，并将其所存的 500 两银子及 6 年的利息一并交给了那商人的后代。这个传说今天听来或许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反映了当年太谷票号的信誉之高。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在当时全国的票号行业中，山西人尤其是太谷人为什么就能独领时代之风骚、而执当年中国金融界的牛耳呢？说起来这中间尚有一段依旧是信则有而不信则无的传说。

那还是明末的崇祯 17 年，已成燎原之势的李自成起义军自陕晋出居庸关，一路浩浩荡荡锐不可挡地直扑北京城而来。一时间京都局势岌岌可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只好派自己的心腹大太监徐高拿一道密旨往请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崇祯想请周奎出面发动外戚及大臣们捐钱输饷，以济当时前线燃眉之急。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已然是“穷庙富和尚”，朝廷国库空虚，入不敷出，而王公大臣手里却是金山银山，穷极奢侈。万没想到的是，那国丈周奎竟一毛也不肯拔，以至徐高为之气愤已极奋力大呼“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才勉强拿出 1 万两银子资助崇祯御敌。不久，李自成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上自了尽。俄顷，李自成手下大将军刘宗敏就在京城铁狮子胡同崇祯爱妃之一田妃的父亲田畹宅中大设刑堂，将所有的外戚王公还有明朝的大臣们抓了起来连夜拷打，结果几乎没费多大的劲，竟从这些王公大臣身上

一下打出几百万两的银子来。

倘若崇祯皇上泉下有灵，得知这个结果恐怕欲哭都没有眼泪了。

没过多久，吴三桂引清军急攻北京城。李自成义军仓皇退走之际，就把上述那几百万两银子加上缴获的明宫库存，一并铸了几万块金砖银砖，每个重值千金，命士兵们用骡车载上，准备运往陕北米脂——李闯王的家乡。当时因为这些金砖银砖分量太重了，以至负责押解的士兵和夫役们一路上叫苦连天，累死的骡马也不时地丢弃途中。当起义军退至山西包括太谷等地途中，身后紧追的清军一路掩杀过来。迫不得已之际，李闯王只好下令将这批金银沿途坑埋并作好记号以待来日。但后来不久，这支义军便告失败，闯王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宫山罹难。于是，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太谷人便白拣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有了这样一笔巨资金银，山西人自然在后来的中国票号业中得天独厚的雄居霸主地位了。

不管以上的传说可信与否，自清朝以来，山西特别是太谷、平遥、祁县三地的票号确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一时间，全国各大都市几乎都有山西票号的联号存在。只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银行业在中国的涌现及其迅速发展，票号业的一些弱点也便逐渐暴露出来。后来孔祥熙在分析山西票号终至衰落的原因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今天读来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他讲道：

“太平天国洪杨之役，和以后的甲午中日、甲辰日俄两次战役，对于山西票号的影响很大，造成为数可观的巨额损失。除此以外，票号老板（掌柜）守旧固执，无从改良，以及股东子弟的奢侈淫佚，不肯读书，也是山西票号愈形式微的主因之一。所以我自幼及长一向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非得苦行孤诣，一滴血一滴汗地向前迈进，否则绝少不失败者。”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曾一度号称“财神”的孔祥熙，就出生及成

长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太谷票号业兴盛和衰败过程，并由此深谙了票号业乃至整个生意场上的个中奥妙。可以说，家乡太谷为孔祥熙日后的发迹、发达并且在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舞台上一展身手，奠定了第一步坚实的基础。

2. 山西孔家溯源

山西省太谷县的孔氏家族，据考系出自山东曲阜小孔村孔氏家族的一支，其祖先即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据太谷孔氏支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至圣先师孔子的第六十一代裔孙孔宏开，考中了三甲进士。放榜那天，孔宏开挤在人群中看到自己金榜题名，不禁欣喜若狂，奔回家中向妻子报喜。欣喜之余，孔宏开望着年轻貌美巴巴瞩目的妻子，望着躺在摇篮里天真可爱的娇儿，不由得感慨系之。他想到，自己昔日寒窗十载，如今总算苦尽甜来，没丢老祖宗的脸面。自今而后，我孔宏开自当宏图大展，干一番于国于民都有功德的伟业来，也好给后人树立个榜样。

不久，孔宏开给朝廷放了外任，赴山西任职。于是孔宏开便骑上头小毛驴，携上爱妻娇子上路了。一路上，在书童和挑夫的簇拥下，孔宏开放眼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一时间吟诗作文，不亦乐乎。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激发了孔宏开的热爱之情，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当官要为民做主”的信念。到山西上任后，孔宏开先后在黎城、交城等地任知县，且为官清正廉洁，颇做了几件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他继承了上祖孔圣人的“仁爱”遗风，爱民如子，兢兢业业，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只遗憾的是，为开一方民众之兴化，孔宏开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竟积劳成疾，终病殁在交城任上。

由于平日里清廉为官，家中并无些许积蓄，以至孔宏开后

凄凉不堪，所遗妻儿一时竟无钱为故人营葬。最后还是当地百姓及几位乡绅出面，念孔知县生前政绩功德，自发地出力出钱相助，为孔宏开料理了后事。此事当年在山西一度传为佳话。可以说在明朝当时的宦海之中，如孔宏开如此为官者，不说绝无仅有，亦属相当罕见。

孔宏开故去后，当时亦有好心人为孔知县的遗孀及其子女凑齐了一笔川资，并劝孔夫人回归故里教子成人，以不辜负孔大人生前积下的一片仁德。孰料那孔夫人竟思夫心痛，情愿留在山西伴故去的夫君长相厮守。就这样，山东孔氏家族的又一支自此便在山西落户扎根了。

那孔宏开便是孔祥熙相距不甚太远的先祖了。

公元 1644 年，大明朝廷为大清朝廷所取代，满人在全国包括山西建立了统治政权。因那孔宏开生前曾是大明朝的七品官员，食过明朝的俸禄。受当时忠君思想的影响，孔宏开的夫人将其两个儿子召至膝前并谆谆告诫他们，要像父亲那样忠心不忘明室，要学晋代名士陶渊明那样绝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孔夫人语重心长地讲，我们孔门后代要有骨气，绝不能助那夷人而欺我华夏。

当时，孔宏开的两个儿子正值年轻，且同其父一样通晓经纬，满腹学问。因为有了母命在上不能违背，这兄弟二人只好放弃了横溢的才华，一生不曾赴试宦途。但为谋生计，在征得母亲同意后，这兄弟二人便另辟蹊径，一齐步入了商海。很快，孔宏开次子孔闻俊的经商才能便脱颖而出，当发了一笔小财后，为了生意上的便利，孔闻俊哥俩儿便携家自交城迁往了太谷。在太谷城西郊的程家庄，孔家落下户来。从此，太谷孔氏自成一系。

不过在这里还另有一说，据说也是明朝万历年间，山东孔氏家族有人中了进士并被派往山西任职。但此人不是上面我们所讲的孔宏开，而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中了进士，之后外

放山西的。据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所说：“明朝确有大量纸坊户从曲阜迁到山西太谷。家谱中记载孔祥熙的先世孔希翥是在明朝时迁到山西的。从孔希翥到七十五代孔祥熙这中间十九代也都是按照曲阜孔族字系行辈取名。”

孔氏族谱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最完整的族谱之一，自宋朝建谱以来，一直谱系不乱。按照孔氏家族修谱的规矩，每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1937 年赶上孔氏大修族谱，当时是由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修谱的，由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山东曲阜孔氏祥榕负责。孔德懋是孔德成的姐姐，她的话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她还回忆了 1937 年修谱的情况，“以前各地有些孔氏族人因年代久远或生活变迁，过去没有续谱的，这次也续了谱。孔祥熙就是这次修谱时续的家谱。”

“当时大修族谱所需经费是向全国各地孔氏族人募捐，我曾看到过一本捐款的帐本，不单是孔祥熙，全国各省县都有孔姓族人捐款。少则 1 元、10 元，多则成百上千。孔祥熙因是当时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长，他捐钱多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孔德成也曾于 1979 年 9 月 1 日在台湾举办的孔祥熙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上说：“我们孔家分成 60 户，孔先生的祖先是属于曲阜纸坊户的。明朝晚年时，由曲阜迁到山西的。民国二十五年，孔先生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曾到曲阜城北四水上的孔家河口——其祖先早年居住处凭吊。”

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材料，很难用具有权威性的文字来说明到底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还是“孔子第六十一代裔孙孔宏开”，二者究竟是谁，在一个准确的时间里或在一个准确的背景下由山东曲阜迁至山西并最后落户太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山西太谷的孔家，肯定是由山东曲阜孔姓族中迁入的。

太谷程家庄，距离太谷县城西门 5 里有余，属城关一带，是一个可以在中国北方农村经常看到的那种自然村落。村风古朴自然，村民诚实和善，多有北中国农民那种特有的吃苦精神。人们默默奋斗，只为着“人往高处走”这一个幻梦般执着坚韧的信念。全村 100 多户人家，可谓小村，但村中街道宽敞，房屋坐落整整齐齐，并且每家每户的建筑都是雕梁画柱，华丽考究。这在当时中国即便是较发达的城镇也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家，十户倒有八户经商从贾；“家家有钱，户户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小康村”了。

当年山西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守家恋土。家里有了钱便不愿迁到他乡过一种“吃甜没有醋”的日子，更不想搬到城里过一种处处受束缚的生活。所以山西人只要富裕了，都爱在故乡的土地上造起漂亮的房子，既壮了老祖宗的脸面，也能过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

也许是沾了老祖宗孔圣人的光，孔家在程家庄算得上是名门望族，说话办事在村里都很占分量。孔氏家族在村里一共拥有 9 幢房屋，其中 1 幢有井，俗称“井儿院”。自当年的知县孔宏开之后，这里孔氏族人中就再没有跻身官宦仕途的人，孔家人倒都是自食其力，凭本事靠力气辛辛苦苦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

这里倒并非孔门后人才疏学浅，因而难以金榜题名。孔圣人的后代，家学渊源自是非同寻常。只因当年孔宏开孔知县的遗孀孔夫人有训曰“不为鞅虏做官”，儿孙们个个不敢违背所致。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百余年的沧桑变迁，孔门后人对当年的祖训就渐渐地淡忘了。孔宪昌——孔子的第七十二代裔孙亦即孔祥熙的曾祖父，自幼聪明过人，少年有为且又刻苦努力，好强争胜，16 岁时应童子试竟荣获头名成绩。

当下血气方刚的孔宪昌在族人的激励下，暗下决心要在下次乡试中再夺魁首，以壮孔门。

当时恰巧有一位同乡，亦即亚圣孟子的后代孟洋，对他威胁最大。两人的学识相差无几，但孟洋的书法要略强于孔宪昌。所以孔宪昌每天发奋练习书法，一写就是几个时辰。果然其书法的技巧大见长进，只是因长期的疲劳过度，致使孔宪昌的体质极为虚弱。

所谓人意拗不过天意。

乡考的前一天，孔宪昌自感身体不适。但为了与孟洋一决高下，第二天孔宪昌还是勉强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赴考。结果，体力不支加上精神紧张，孔宪昌当场咯血，元气大伤，未能坚持到终场就抱憾先退。最后自然是孟洋荣登榜首，孔宪昌数载寒窗苦读，毁于一旦。

当即孔宪昌羞愧难当，他恨自己半途而废，不能为孔门争光。这一恨一忧，竟使得孔宪昌一病不起。临终前孔宪昌用自己那双握过笔杆如今已骨瘦如柴的手拉着 9 岁的儿子孔庆麟，艰难地一字一句地立下了家法：

“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能这样，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蹈我的覆辙，切记，切记！”

言罢，孔宪昌便含愤去世。自此以后，孔门子弟再一次与科举无缘。

关于后来太谷孔氏家族的沿革发展，说法不一。其中一说即孔门后人弃官从商，最终成了山西巨富。此一说多为现今人们认可。

再说那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本来才学人品一如其兄。只因有了前面亡兄遗训无法违背，孔宪仁只好弃官从商，并很快创办了志诚信票号，当上了票号掌柜。在孔宪仁的精心操持下，太谷志诚信票号的生意迅速红火起来，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利润直线般年年递增。没用多久，志诚信就发展成为当时太谷城内三家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

可惜的是，孔宪仁膝下无子。而他也因为票号业务日渐庞大，自己一个人又精力有限。最后，孔宪仁只得把偌大一份票号生意，交给了长侄亦即孔宪昌的儿子孔庆麟来掌管。而他自己呢，索性做了志诚信票号的大股东，坐享其成便是了。

这孔庆麟便是孔祥熙的祖父了。他字瑞堂，堪称是一位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且十分讲究实干的能人。在孔庆麟身上，当时人们依稀能够辨出其父孔宪昌的影子来，这便是精明强干，富有韬略。就这样，在孔庆麟的苦心经营下，并且有孔宪仁在背后撑腰支持，太谷孔家的票号生意越做越红火，同时又兼做杂货生意。一时间，孔家在太谷城内有义源盛票号、在北京有志一堂镖局以及会通盛、会通远和义合昌等票号或买卖，此外在广州还有广茂兴、在沈阳有源泉博以及从别人手中买下的太谷三晋源等买卖。最繁盛时，孔家的票号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远至新疆的迪化、外蒙的库伦及至安南（今越南）的西贡和日本等地。

当年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即在北京的义和昌任文书，后来又遵父令返回太谷主持义源盛和三晋源买卖。

孔庆麟眼光远大且心胸开阔，为了孔家的生意能不断拓展，他常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国内各大都市及商埠之间，可谓不辞辛劳，兢兢业业。按理说，有了前述那众多的买卖所赚得的丰厚利润，一年下来的收入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只是因为当时孔家票号的真正老板并不是孔庆麟，而是孔庆麟的二叔孔宪仁，所以孔庆麟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挣得的收入也不过小康水平。以致当年太谷人讲起志诚信票号，只认得老掌柜孔宪仁，却并无多少人知晓还有一个孔庆麟忙里忙外，实际上支撑着局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当年的孔庆麟也就不过是个高级的打工马仔，充其量一个白领阶层的高级职员罢了。

不过，关于孔庆麟经营太谷志诚信票号一说，至今史界仍有质疑。因篇幅限制，我们不在这里一一辨识了。

后来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叶，伴随着近代社会银行的出现，票号业便每况愈下，渐趋没落了。也就当此时，孔氏家族亦家道中落，由“小康”下坠至勉强维持温饱了，以致孔祥熙出生后没赶上几天好日子过，便将最该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淹没在生活困顿的重压之中。据有关史料记载，孔祥熙幼时曾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冬天，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到太谷城里捡烂炭（一种燃烧过但仍可再燃取暖的煤渣），以至弄得浑身污渍，蓬头垢面。

有关太谷孔氏的家道中落原因以及孔祥熙幼时所吃辛苦等，除上述所谓票号萧条原因之外，尚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当时正值孔祥熙之父孔繁慈吸食鸦片最凶的一个时期。而孔祥熙幼年所吃辛苦的原因，则除了家道中落之外，主要在于他 6 岁时便失去了母亲。没有母爱的呵护，一个人的童年难免黯淡无光。尽管孔祥熙的父亲为了他和妹妹不至受到委屈，竟终身未再续娶，也无法替代那世间本属弥足珍贵的母爱。

常年奔波在外的商旅生涯，使得孔庆麟见多识广，心胸也变得十分豁达。在生意场上，他从不计较一时一事上的蝇头小利，这在当时中国的旧式商人中应该是不多见的，因而也备受钦佩。孔庆麟虽然自奉勤俭，却也乐得扶危济贫，热心于修桥铺路之类善事。在当时当地乡亲们中间，孔庆麟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爱戴。一年当中，孔庆麟奔走在外，难得有几天消停日子能在家度过。尽管如此，每逢孔庆麟自外埠归来之际，他总要左邻右舍的到众乡亲家中走一走，问候问候有无需要他帮忙出力的事情等等。可以说，当年的孔庆麟在太谷老家人缘极佳，以至人们不称他为掌柜或老板，而是普遍亲切地称他为“孔先生”。这在旧中国统称商人为“老板”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是十分难得了。在当时的太谷人印象中，孔庆麟堪称一位公认的文化修养极高的儒商了。

“孔先生”不仅经商在行，教子也很得法。虽然一年之中，孔庆麟难得在家，但他仍不忘严教子女。他用儒家的传统孔教，也